

【论 文】

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与近代中日关系¹

王 柯²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这120年间，前半是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后半围绕是应该尊重历史还是应该集体失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几乎一直发生着冲突。然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评论两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时不可忽视的前后顺序。

笔者一向认为，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历程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点。其一是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是汉民族，另一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许多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是通过日本（而非通过其他国家）接受了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影响。这两点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革命家对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终演变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这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命的理论，恰恰是从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学到的。从梁启超在日本学到“民族主义”这个词的那一天起，中国人的原初的淳朴的民族主义就与建设近代国家和新型“国民”联系在一起；然而，作为老师的日本，却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变成了动员煽动国民参加侵略战争的工具，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对抗的舞台。所以，认识中国近代对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首先应该按照时代在中日近代关系的层面上对它进行梳理。

1. 从万里长城到北洋水师：中国的海洋意识与甲午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摆出一副“以不变对万变”的架势，自我陶醉于传统的“天朝”体制之中。与此相反，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的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在日本却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到“洋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终于着手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从“锁国”转向“开国”，1860年代开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性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近代民族主义之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膨胀，并且很快达到了1874年的“出兵台湾”、开始鼓励进行对外扩张的地步。

“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³它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而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就会指向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昔日的学生变成今日的强敌，日本的侵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然而由于内外交困，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塞防论主张收复在1860年代的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

¹ 本文刊发于《文化纵横》2014年6月号，第74-80页。

²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历史系教授。

³ 井上清《近代日本史における中日戦争》，《日中戦争と中日关系》，原书房，1988年，11页。

的预算用到充实海防力量中。其实，不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然后将这个假想敌可能来侵的方向列为国家的防卫重点而已。“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假想敌。

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说明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摆脱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的思维。关于近代中国衰退的原因，人们常常列举清王朝统治阶层的保守与自大、政府官员的腐败与不作为、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等，然而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缺乏海洋意识。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传统的中华世界是以陆地为中心的世界，在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里，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中国人更愿意把从海上来的人们都看作是来“天朝”的“朝贡使”。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中国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到要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了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对中国以及北方民族政治传统的继承，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进一步发酵：在内陆方面虽然屡建“武功”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主权范围，但在海洋发展的方面却显得更加慎重，断断续续地实行以海禁，延续着锁国政策。

但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为了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争相加强海军力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¹日本进攻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但孱弱的福建水师在84年的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清朝政府之后又着手建立新的海军力量——北洋水师，但是为了庆祝西太后60岁寿辰，军舰购买计划搁置，2000万两的海军军费被挪用到营造颐和园上，再次表现出在国家防卫意识上的轻视海洋的思想。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海军力量终于凌驾于北洋水师之上，从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²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甲午战争的结果长期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背景上依然可以看到有对甲午战争给予中日关系之影响进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2. 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1896年所签订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迫使清朝政府承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同等的权益。然而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³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在看到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¹ 魏源《海国图志》卷一、卷二，筹海篇。

² 池田诚《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田村悦一等编《岐路にたつ国際秩序》，法律文化社，1989年，299页。

³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51页。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进入民国时期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建国而完成了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中国民众对二十一条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感，远远超出了中国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预料。1919年，由于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承认，爆发了被定位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当时一位住在北京的日本记者就认为，从性质上来说，“五四运动”不过是一场纯粹的反日运动。¹实际上，“由于日本的二十一条1915年时所受到的国家性的耻辱，也使中国增加了不得不通过实行基本变革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再生和重组的必要性”。²可以说，认识“体制不足”和“文化不足”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逐渐觉醒的过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也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叶嘉炽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这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在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³

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3. 抗日战争：近代中国的“尊王攘夷运动”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一个民族通过与其他各民族的接触，获得了自我。民族对自己独自性强烈认识的程度就是由这些接触的紧密程度、丰富程度及多样性所决定的。而通过战争来接触要比和平接触对于促进民族联系的效果要更上一层”。⁴直到1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9.18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最好教员。

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也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的抵抗的时间点（19

¹ 燕京雁信《日本政府，五·四排日運動に抗議》，《新支那》1919年12月19日。

² J.K. フェアバンク 著《中国》下，市古宙三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年，256页

³ 叶嘉炽《宗教与民族主义：民初知识分子反教思想的学理基础》《中国现代史论集》（六），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121页。

⁴ F.L. シューマン《國際政治》上，长井信一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319页。

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193年的“9.18事变”算起,而且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就是“以中华民族本身为敌”的战争。¹例如731部队将中国人作为细菌武器试验工具,就是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的证明。有日本学者揭露,由天皇直属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参谋总长一载仁亲王(皇族)曾亲自对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下达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根据大陆命令第二四一号做出如下指示:1,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在其占领地区内的作战中使用芥子气(黄剂等特種資材)并研究其作战上的价值”,但同时又提出:“采取万般措施以隐匿事实,尤其是对第三人绝不能伤害,同时要绝对对他们隐匿事实。”²这也说明,上至皇族、下至“皇军”,普遍具有对中国民众进行民族屠杀无罪的思想。因此,挂着“皇军”名义的日本军队敢于屠杀中国人,而这种民族屠杀又自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仇日反日民族主义。

1937年1月2日,在北京创办崇贞学院的清水安三带着夫人等,6名日本人一起拜访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日本来客的要求,胡适在名片上写下了“尊王攘夷”四个字相赠,而这让日本来客们感到非常不安。³卢沟桥事变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与“尊王攘夷”运动时的日本社会形势十分相似,一方面是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分裂对抗,而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外国、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势力。然而,胡适之所以给来访的日本客人赠送“尊王攘夷”四字应该还有一番深意:尽管中国国内各个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间明争暗斗,各个地域、社会阶层之间分裂对立,但是中国人在对内处理“尊王”问题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要对外一致“攘夷”的重大问题。

1931年的9.18事变,帮助中国民众认清了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围绕“攘”的方法和“尊”的对象,国内各政党、阶层、集团依然存在深刻的对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认为:因为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中国的军力难以与日本相比。所以轻言抗战的豪言壮语将招致亡国,故而他们反对轻易对日宣战。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从1932年的淞沪抗战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连串的抗日呼声,证明中国民众在面临民族存亡之时,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1937年7.7事变爆发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言:“一个月之内解决支那事变”,但是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国的美梦很快落空。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中国国内形成了新的团结,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表现出了“必死的民族抵抗”。⁴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表明态度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民族大义面前,各个党派势力抛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因此也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中国近代的“尊王攘夷”、造就具有国家意识之国民的运动。

4. “同文同种”是一种鸦片

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是与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近代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所分不开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战争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国家思想的启蒙。变法派以为中日两国国情接近,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清王朝所借鉴,因此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戊戌变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则学到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想法又得到了抱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陆浪人、以及政界和军界的怂恿。长期对日本的政界及民间抱有极大期望的孙中山,将日本视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以“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一直期待通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为了实现中国革命,后期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他在1915年2月5日与日本民间人士间签订的“中日盟约”中承诺给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过了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⁵

¹ (井上清「近代日本史における中日戦争」,《日中戦争と中日关系》,原书房,1988年,3页。

² 《大陆指第452号》,见粟屋宪太郎、吉見文明编《毒ガス戦関係資料》第2卷,不二出版,1989,258页

³ 《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1934-1939,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365页。

⁴ 刘大年「抗日戦争と中国の歴史」,前掲《中日戦争と中日关系》23,24,29页。

⁵ 藤井升三「二一カ条交渉時期の孫文と《中日盟約》」,市古宙三教授退官纪念论丛《论集,近代中国研究》,

从1896年起，清国内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由后人称之为“日本留学运动”。日本留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原因可以列举出清朝政府的支持、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一九〇四年）、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一九〇五年）以及图谋通过接受清国留学生在大陆扶植亲日势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发出的邀请等。但不论是哪一种理由，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民众以及青年学子所接受，就是因为它与当时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中的“同文同种”的因素相通。

清国留学生人数表

1896年	1898年	1899年	1900年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3人	77人	143人	159人	266人	727人	1,242人	2,557人	8,000余人

（根据王奇生《中国留学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为其极力推荐中国青年选择日本留学的理由作了充分说明，除了政治的考量之外，两国地理、风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来打动人的地方。而在留学生自己的叙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内容。孙中山等革命家之所以愿意将日本当作革命的根据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同文同种”的认同。他一直到去世前，都在呼吁“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之国”，一直抱着日本与中国利害相通，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的观点。¹然而，中国人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这种基于人种、文化上的主观认识，实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想象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过是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成立的。这种意识或者事实关系，在中国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时进行强调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日本产生侵略大陆野心时自然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当然在日本，也有像岩仓具视、樽井藤吉那样从“同文同种”的意识出发，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鲜）建立同盟关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来所谓“辅车唇齿”、即唇亡齿寒的东洋同盟论，比起“同种”的意识来，更加重视的还是地理上的两国或三国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其收益的目的还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亚洲的入侵。福泽渝吉就是在看到东亚各国不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的前提下，看出了对于日本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无用，于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的。²因为将一切为了日本当作唯一的目的，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其实从最初就为日本定下了将亚洲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与中国人更希望把中日两国的关系放到人种和文化的联系中去理解相比，近代日本其实从最初就是把两国关系放到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过的亚洲团结，最终也不过是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上述终极目标下的一颗棋子。在如何认识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会中全心全意地真正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仅限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个别“中国浪人”；而孙中山却不分朝野一直追求与日本的联合，直到1919年才开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然而，变法运动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学也好，不论哪一个其实都是在证明首先接受了西欧价值的日本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逐渐从崇拜转为蔑视。“秃子头的李鸿章，最后变成了秃和尚”，这个俗语很好地诠释了当时日本人看待中国人的心理，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社会里作为一种蔑称的“清国奴”开始普遍流行。³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清国留学生，对此最为敏感。“在留学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层出不穷，就是在他们的对日观中，加入了留学生的实际体验，从而使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扩大了。”（『近代中日关系史

山川出版社，1981年，336-341页。

¹ 山口一郎《近代中国对日観の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1970年，60页。

² 初濑龙平《“脱亜論”再考》平野健一郎编《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19页。

³ 安藤彦太郎《日本人の中国観》，劲草书房，1971年，48页。

料』第Ⅱ集，龍溪書舎）。事实证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陆的亲日势力的清国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日后反而变成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先锋。

最大的悲剧在于，日本人事实在福泽渝吉的时代就已经抛弃了“同文同种”的思想，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一直难以舍弃“同文同种”的幻觉。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共产党，“同文同种”的意识一直都活在历代的对日关系中。蒋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会反复向国民诉说日中两国原本同文同种，本应互相提携成为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家，也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依然强调中日两国原是同文同种。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福传说”越传越广，甚至还在“下海”之处建起了徐福庙，包括许多对日本抱有成见的国民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徐福传说”对“日本人本是中国人的后裔”一说进行反复求证。

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文同种”的思想就像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鸦片。然而可怕的是，这种鸦片会带来剧烈的副作用：越要说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就越想证明日本与中国为“同文同种”；但是由于日本拒绝这一包含中国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祖国意味的思想，想证明“同文同种”的愿望越强烈换来的失望感也就越强。于是，在这样一种“同文同种”的语境中，能够出现的因素就只有中国的强烈“期待”和日本的极大“背叛”，而结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不得不承认，“同文同种”这个鸦片制造出来的幻觉，在以对抗反抗日益膨胀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迷惑中国人的兴奋剂的作用。

5. 不断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温床的日本

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²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背景上，的确有清算近代史上所遭受的耻辱的历史成分。但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耻辱感之形成，与以侵略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时至今日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社会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不断蔓延的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又是不断刺激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膨胀的原因。

毫无疑问，近代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抗侵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它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社会稳定和再次把国家和国民推到战争边缘的因子。在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果还要把它当做是民族国家发展最高的唯一价值，就无异于是把自己从国际社会孤立出去。而今天，对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可谓生死与共地步的中日两国来说，只有建立起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才能利人利己。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层次上，民族主义的影响都应该得到适当的控制。然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被侵略的历史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被动型的民族主义。因此，控制中国民族主义使其不再膨胀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自身，而在于有没有受到外部侵略以及会不会否认那段侵略过中国、并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巨大创伤的历史。

但是遗憾的是，今天仍然不停地揭开那块伤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谄熟投票政治游戏规则的日本政治家们为了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接二连三地否定侵略中国的历史，拿到了政权的政治家们则沉溺于玩弄国际政治的文字游戏：嘴上说着“并不否认给亚洲各国国民带来了痛苦经验的历史”，行动上却质疑村山谈话，质疑河野谈话，质疑东京审判，甚至公然以政府首脑身份参拜供奉着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言行，对于一个着重历史型的、被动型的民族主义来，当然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因此不得不说：当年中国对外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教育和刺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今天这样一些政治家的手中，日本依旧是一个不断地向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提供着发酵条件的温床。

¹ 山口一郎《近代中国对日観の研究》，94页、100页。

² J.K.フエバノク著《人民中国论》卫藤沈吉译，読売新闻社，1970年，27页。

【论 文】

论政府对散杂居民族流动经营上的介入

——以切糕门事件为例

张 龙¹

摘要：少数民族流动摊贩进入城市，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营种类的多样化，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习惯、生活方式、语言等方面与当地城市民族的差异，不免与当地民族发生冲突。面对冲突事件中，政府在其中应采取什么措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摊贩；城市管理；冲突；民族矛盾

一、政府应促进少数民族流动摊贩的文化适应过程

近些年，我们社会被太多的热点所笼罩，边缘人群往往是引人关注的一个焦点。边缘人群一般是指易被社会大众所忽略的一类群体，这类群体往往需要来自社会的帮助，这种帮助带有辅助性质，来自经济、文化、教育等。而这类群体见诸于报端的常有农民工、流浪者、残疾人，以及一些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摊贩。以少数民族流动摊贩来说，背井离乡来到一个文化迥异的城市，他们需要融入一个城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面对着一个城市主流群体的文化而茫然、无助，如果没有适时地帮助，问题往往容易产生。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把人口流动的原因分为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学习培训、拆迁搬家、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其他等 9 种，其中前 4 种可合称为经济性原因，后 5 种可合称为社会性原因。务工经商是全国最重要的人口流动原因，占全部流动量的 30.7%²（p. 60-65）这些务工经商者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流动摊贩。

少数民族流动摊贩进入城市经营，不可避免地还存有原居住地的习俗。以“切糕门事件”为例：2012 年 12 月 3 日，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一条消息称，“村民凌某在购买新疆人核桃仁糖果时，因语言沟通不畅造成误会，双方口角导致肢体冲突引发群体殴打事件。事件造成二人轻伤，损坏核桃仁糖果约 16 万元。加损坏的摩托车和受伤人员共计 20 万。目前，平江公安天岳派出所将凌某刑事拘留，十六名新疆人员财物得到赔偿并被遣返回疆”³。此事件一经发布被陆续转载，引发轰动效应。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此切糕是否价值 16 万元；另一个是新疆维吾尔族经营是否涉及强买强卖。而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背后的文化差异。

¹ 张龙，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学。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邮箱 ktnome@126.com

² 万良杰，城市流动散杂居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2（3）

³ 海南网.16 万切糕事件始末[EB/OL].[2012-12-05].http://www.51taonan.com/page/news/sid/38996/cid/25/id/16890

稍后新疆政府官方回复的一个微博点出了问题根源：“远方朋友何苦恼？公平法理人人要。切糕、切糕，怎么了？沟通和习俗差别来添扰。彪悍粗犷是外表，内心纯善真性情。性格开朗声音高，缺斤掺假见不到。十元还掉八九他不恼，若是谈拢价钱又不要，哥们儿以为讨他开心闹，为人处事真诚很重要。”¹

新疆地区对切糕销售一般论两计算，而城市习惯是以斤计算；切糕切了不管多大块就必须买，这也为当地城市居民不能忍受；城市居民习惯于问价及讨价还价再决定买不买，而少数民族流动摊贩（以维吾尔族穆斯林为主）认为问价不买在耍他们，也是一个让彼此不快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民族成员流入到另一个非本民族成员的城市时，他需要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入乡随俗”，如果少数民族流动摊贩依然依据自身的传统习惯在流入地城市销售，必然成为售买双方矛盾的冲突。

客观说，这些都是文化差异的因素。作为一个来到异乡的成员，他们的文化适应问题如果不解决，必然会持续引发连锁的矛盾效应。谈到文化适应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个概念，不同概念的定义很多，以中国学者总结出的一个概念来看：文化适应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指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引的过程。这种相互影响可以是不同民族之间，也可以是不同地区之间交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获得一些新的特质。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和扬弃的过程，也是产生新文化和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²（pp. 74-78）。而关于文化适应的过程，美国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式假说：

（a）接触阶段；（b）不统一阶段；（c）否定阶段；（d）自律阶段；（e）独立阶段³（pp. 4-10）。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他对于流入城市来说，属于个体面对群体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面对的文化适应属于个体去适应新的文化模式。探讨他们的文化适应过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在接触阶段，他们需要面对着不同于以往家乡的同族、同政策的群体和社会，也就是一个陌生社会。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们为了满足生理需求，需要克服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必然要努力去交流、沟通。由于接触过程中的自文化与异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不统一阶段，这也是他心中存在着矛盾的心理阶段。如何让两者统一，自己内心能接受，又成为他们个人的一个适应时期。如果这期间，他们得不到当地社会的帮助，很容易走向另一个反面，也就是切糕事件中，继续以自文化传统的销售模式进行销售，当流入地城市购买者表示不理解、不接受时，为了生存需要或者牟取利益的需要，他们就会采取暴力方式来取得销售成功。而这种模式长久下去，必然导致自文化与异文化的冲突扩大化，甚至延伸化，影响民族关系。而如果能得到适当帮助，当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的引导、支持，他们就容易进入文化适应的否定阶段，对自文化的一些传统在当地不适应加以认同，需要调整，就此重新建构。在重新建构过程中，逐步适应当地的异文化，也就是进入自律阶段。经过自律阶段的文化调整，他在保留自文化不与当地异文化冲突部分的情况下，认可当地异文化的相应部分，也就进入了独立阶段，此阶段即属于文化适应成功阶段。经过这五个阶段的个体，基本上能融入这个流入城市，不为此城市群体排斥，有利于其个体的生产经营及生活。

而对于流入城市来说，城市群体也需要逐步适应这类流入个体的文化模式。这期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中介介入的话，这两种文化模式的冲突、撞击就难免的。如果主要是冲突没有融合，最终也会引发相应的问题。以新疆 7.5 事件为例，最初起因来自广州事件，而广州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冲突的异变如何诱发新疆事件的发生呢？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冲突。

调和与适应问题，一方面需要城市管理部门作出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少数民族流

¹ 人民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切糕、切糕，怎么了 [EB/OL].[2012-12-05].<http://money.cnfol.com/121212/160,1538,13921638,00.shtml>

² 黄洪琳，刘锁群.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2004（5）

³ 徐光兴.跨文化适应的留学生的生活[A].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援助[C].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出地加以配合。城市管理部门在发现少数民族流动摊贩经营时候，要普及城市管理条例，讲解当地民众购买习惯。可以提供相关设施来普及。比如标上明示价目牌等。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对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导致了双方的沟通问题，如果沟通困难，更谈不上促进少数民族流动摊贩的文化适应了。这需要城市管理部门培养合适的民族工作管理者，架起民族之间文化适应的桥梁。

二、政府管理部门应明确民族问题和违法经营区别

近些年，国内的一些城市管理部门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营的管理上，显得有些两难，甚至出现两极化。一种方式是：对少数民族流动摊贩的一切经营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发生大的矛盾冲突时才介入，并且无论对错主要是安抚少数民族摊贩。可以说，这种不平等对待的管理方式造成了汉族极大不满，也让少数民族流动摊贩有了一种特权思想，等到你真正按照国家政策去管理的时候，少数民族流动摊贩会因为长期经营形成的习惯拒绝政府管理，导致同政府管理部门的冲突。另一种方式是：对少数民族流动摊贩的一切经营都严格按照同汉族摊贩的标准统一管理，这种做法本质上没有问题，在处理方式上，有些管理部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行为粗暴，无视来经营的少数民族流动摊贩客观上属于边缘人群，同一些贫困的汉族流动摊贩一样需要给予他们一定的优惠政策，自然这样的优惠政策并不是以损害城市管理为代价，这就需要一定的智慧方式来解决。

针对切糕事件，许多地方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种情况的有岳阳市处理方式，这种方式当前饱受诟病。一位维吾尔族学者谈及此事认为“警方为何支持敲诈”：“强买强卖在全国各地的车站、港口、旅游区等都不同程度存在，岳阳的“切糕事件”就性质来讲并没有很特殊的地方，之所以引发潮水般的围观和吐槽，是警方处理此事的结果和涉事人员的地域族群背景。损坏的切糕值不值 16 万？毫无疑问，肯定远远不值。恐怕岳阳警方也知道不值，但为什么这么一个具有敲诈性的要求竟然得到了警方的支持？这和事件当事一方的民族身份有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在内地发生的涉及少数民族的案件，都会让当地警方和政府头痛，而在处理的过程中，由于担心引发‘民族问题’，往往采取一些不能坚持原则和法律的作法来息事宁人。”¹

这类切糕事件的处理上，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措施也是有目共睹的，（1）“2009 年 1 月 12 日凌晨 5 时许，石家庄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涉嫌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故意伤害，称霸一方，危害群众，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团伙，抓获涉嫌违法犯罪人员 34 名（均系外地人）。据查，这伙卖切糕人员于 2008 年 9 月初，由石家庄市公里街、火车站广场游动到新华集贸市场，其作案对象多数为年轻女性。当购买者询价时，他们回答切糕每斤 3 元。由于切糕质量重，往往受害人只要一点，卖糕人故意一刀切下多出数倍，而且价格由 3 元一斤变成 3 元一两，本来三四元钱就能购买的切糕一下子变成五六十元，甚至高达二三百元。一般的购买者身上没带那么多钱，难以支付。但若是不买，这伙人便采取以多欺少、威胁、恐吓、围攻、限制购买者的人身自由、侮辱甚至殴打等手段，强迫购买，不买就不让走，甚者纠集同伙对卖主进行殴打。多数女孩禁不住他们的恐吓，往往会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拿出。有的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后还不足以支付切糕钱，只好乞求路人共同买下。有的实在交不出钱就会遭到殴打，侵害群众达数十人次。仅 110 受理的案件就达 56 起。警方还查实，该团伙甚至围攻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对社会治安、市场经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民愤很大。”²（2）“昨日（注：2012 年 12 月 5 日）上午，宁波南站，一小伙要买 10 元切糕，却莫名其妙地被强卖 160 元，小伙气愤报警。宁波特警迅速出动，最后

¹ 环球时报.维吾尔族学者谈 16 万新疆切糕案:警方为何支持敲诈

[EB/OL].[2012-12-05].<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21205/17564596.html>

² 栗占勇.石家庄破获“切糕党” 强迫买切糕不买就殴打[N].燕赵都市报, 2009 年 1 月 13 日。

没收了三大车切糕。”¹（3）“天桥区（注：山东济南）决定于2012年12月15日至2013年1月14日开展代号为“畅通行动”的综合整治工作，类似“天价切糕”欺诈销售、黑摩的、临街商业房“伸舌头”等9项内容被列入整治范围。”²

对这三个城市的做法，值得反思的是，石家庄市为什么在案件发生达到56起才处理呢？而宁波警方和济南的处理行动也是在岳阳切糕事件发酵后采取的一种及时行动。固然，这几起事件处理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反映了内地管理部门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经营者的事件上缺乏有效的措施。维吾尔族学者认为，“这些事情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内地警方和地方政府对国家的民族政策缺乏足够了解以及在工作中缺乏处理涉及与少数民族有关事务的经验。像此类事件在新疆也会发生，但绝对不会是这种结果。新疆在处理类似案件时的原则是“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都作为民族问题”³。在处理这类事件中，内地政府的态度是：“在国内民族交流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内地的政府部门也需要认真掌握国家的民族政策以及提高处理涉及民族事务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不在发生涉民族案件时手足无措，‘反暴力、讲法律、讲秩序’应该成为不论在任何地方处理涉民族事件的基本原则”。⁴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追求自身发展的社会化过程中，其行为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在增强，在外界不良诱因的驱使下，极易偏离社会规范，实施违法犯罪行为”⁵（pp. 163-169），这就引发一种认识：如果政府管理部门在少数民族流动摊贩进入初期就提前介入，对他们进行有效管理，促进彼此文化适应的协调，一定会发生这类事件吗？一个新疆汉族人对此事看法是“首先，要说明的是维吾尔族是全体信仰伊斯兰宗教的民族，宗教对其信众要求很严，尤其是饮食和食品的亵渎，就是对安拉（神）的最大背叛。这种观念已经在维吾尔人血液中根深蒂固数个世纪。作为没有精神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在食品里面搞鬼、使坏、缺斤短量将受到内心道德谴责。”⁶但为什么这类虔诚的宗教徒会走向信仰的反面呢？这是我们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学者应该进行思考的。个人认为，他们对自身文化适应程度不能很好把握，当他们同异文化交叉不能很好地得以解决，就完全进入文化适应的否定阶段，此阶段是完全否定异文化，肯定自文化。为此，对异文化群体改以敌视态度。而当地政府再由于缺乏对民族问题的应对措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放任状态，就此导致法纪在这类群体上的“无为”状态，大量损害了当地群体的利益，容易导致民族之间的信任、矛盾感增大，反而更不利于民族感情的增进、民族之间文化适应，也不利于民族融合。

三、政府管理部门应提供文化适应的渠道

文化适应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一个沟通的平台。这个平台一是语言；二是对彼此生活习俗的了解。

万良杰认为：“城市对流动少数民族接纳有着极大地选择性，对有利于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流动少数民族会被城市顺利地接纳，如少数民族的知识阶层、干部、投资者等。因为这部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较高，适应能力较强，不仅接纳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接纳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秩序，

¹ 深圳广电集团.宁波：小伙买10元切糕被强卖160元，特警没收三车切糕 [EB/OL]. [2012-12-06]. 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2_12/06/19910709_0.shtml

² 董从哲，山东济南规定再卖“天价切糕”将被重罚[N].齐鲁晚报，2012年12月15日。

³ 环球时报.维族学者谈16万新疆切糕案：警方为何支持敲诈 [EB/OL]. [2012-12-05].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21205/17564596.html>

⁴ 环球时报.维族学者谈16万新疆切糕案：警方为何支持敲诈 [EB/OL]. [2012-12-05].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21205/17564596.html>

⁵ 高永久，曹爱军.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驱动因素与社会效应[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⁶ 天涯论坛.一个新疆汉族人对所谓切糕事件的看法 [EB/OL]. [2012-12-13].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926043.shtml>

也就接纳了城市，这种接纳无疑会促进城市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就排拒而言，城市排拒的主要是流动少数民族中文化素质较低的一部分人。由于其本身文化素质较低，适应能力较差，生存状况不理想而产生，被排拒的人在心理上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秩序、生活方式的排拒。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结构模式难以改变。”^[1](pp. 60-65) 而切糕门事件中的群体，基本上属于流动少数民族文化素质较低的那部分人，这类群体属于城市排拒的一类人。也恰恰是这类群体需要更多的沟通平台。

我们来看第一个平台问题。语言是彼此沟通和交流的工具。汉语作为我国国内通行的语言，是各地民众普遍使用的交际语言。但是我们却很少了解，对于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由于前期语言学习的短路，他们的汉语能力欠缺。如果没有外来帮助，他们要真正融入一个城市文化，并扩展开来，可以说难度很大。以《南方周末》报道的另一个卖过切糕的维吾尔族青年艾尔肯为例，“与顾客讨价还价，直率却口讷的他只能挥舞着手比划，这曾经吓跑了一个小女孩，‘很难受’。艾尔肯初中时的汉语课老师，自己的汉语就说得磕磕巴巴。如今，克孜勒博依乡学校的 28 个汉语老师，也仅有 15 个是汉语专业毕业。没有足够的汉族老师，是老师阿衣努最大的担心。语言是他们一个极大的问题，由于文化的隔阂，他们缺乏与人沟通、交流，进而提高汉语水平的能力”。²而这个瓶颈一时很难解决，这就难免要涉及到流出地对他们前期的汉语教育培养问题了，需要提高汉语教师水平，解决他们小学起的汉语教育问题。

客观来说，大多数维吾尔族售卖切糕的人生生活状况并不乐观。下面有两例例子：（1）“早晨 9 点，艾尔肯与同伴们骑着三轮车，到东直门、中央民族大学等地贩卖，常需要骑行 30 至 40 公里。午饭吃自带的馕，或是到拉面馆吃碗拉面。夜晚 9 点，他们相约返回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家，由于收入微薄与租房困难，多是四五个人，挤在 10 平米大小的小屋或地下室。租金 500 至 800 元，大都破旧、潮湿，且无法供暖。艾尔肯常要在寒风中站上一天，他被城管抓过十多次。每次车与切糕被一股脑没收，需要缴纳 300 至 500 元，等上 15 天才能取回。对于艾尔肯来说，更大的痛苦则在于语言。每次当他站在街头，用蹩脚的普通话叫卖时，人们总会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偷窃与强卖的确在一部分人中存在，而对辛苦打拼的艾尔肯们来说，较低的文化水平与生活阶层则是这个群体的形象滑向负面的加速器。他们不善言说、传统习惯与内地迥异、难以或者干脆不愿沟通导致新疆农村年轻人很难在内地被接纳。”³

“吐尔逊在广州遇见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租房。房东总对他们不放心。看到满大街的租房信息，吐尔逊就是租不到心仪的房子。他们现在住在小北。这里是一个城中村，房子大多是三四十年前所建。除了房东之外，他们很少和这里的居民交流。周围的居民很多人感觉“这些新疆人说话声音很大，很害怕，不敢和他们接触”。9 个人挤在一个不到 20 平米的房子里。房间里没有窗户，不开灯的话，唯一的光线来自墙与墙之间的缝隙里。打开门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鼻而来。因为房间太小，9 个人只能打地铺。”⁴

我们可以看出，这类群体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情况，不可能再有条件去进修汉语。而由于他们的自身习俗问题，周边的人对其也采取隔离的措施，这并不利于他们的汉语水平提高。因此，对于流入地政府来说，如果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有条件的话，可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免费汉语培训，如果短期内不能免费为他们提供汉语培训，政府管理部门应当招聘有专门的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工作人员，固定管理这类人群，定期为他们解决问题，提供文化咨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他们创造同周边人群语言交流的空间和环境。

关于第二个平台，是对彼此生活习俗的了解。尽管我们许多人知道我们国家有 56 个民族，

¹ 万良杰.城市流动散杂居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 2012 (3)

² 记者范承刚 实习生贺风玲谢佳熹.卖切糕的年轻人[N].南方周末,2012年12月13日

³ 记者范承刚 实习生贺风玲谢佳熹.卖切糕的年轻人[N].南方周末,2012年12月13日

⁴ 习宜豪、贺风玲.我们不是“切糕党”[N].南方周末, 2012年12月13日

但真正了解各个民族习俗的人并不多。在今天这个民族之间交流交往增多的时代，如果不采取增进民族了解的措施，切糕门事件的发生依然不可避免。

如何解决第二个平台——习俗问题呢？我认为各地政府应该多做些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可以增加些公益性广告，介绍一些流入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为特色。促进了解，方能便于沟通。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这些民族流动摊贩进入流入城市，他们还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比如：另一个售卖者吐尔逊，“到广州后，他最初在天河公园卖羊肉串，卖了几天又遇见了这边的老大。老大要求吐尔逊必须为他打工，一个月给他 300 元钱的工资。吃了几次亏的吐尔逊这一次选择了妥协。给卖羊肉串的老大打了一阵子工以后，他一个人开始骑着三轮车沿街叫卖切糕。即使现在，卖羊肉串的老大，仍然会派人来他们的切糕摊砸场子。”¹

从中可以看出，当前我们面对的少数民族流动经营的问题，很多是地区管理制度、设施的滞后引发的问题。而面对这些属于政府职能的问题，政府管理部门提高城市和平环境、促进城市管理是责无旁贷的，并不是因为有了少数民族流动摊贩，才需要管理的。

以切糕事件来看，政府需要提供特困、边缘人群的帮扶主要有：一、少数民族流入地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措施滞后；二、少数民族流入地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帮扶缺失。

时代快节奏的发展，对于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的少数民族群体，恐怕很多人还不了解品牌效应，也不了解规模经营、物流效应等等现代商品理念。而这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如果不能得到快速应用，像传统的切糕生意有可能再一次同他们失之交臂。尽管作了多年经营的个别人有了这类意识。像吐尔逊，“希望通过广告手段树立品牌效应。‘下一步，我们打算明码标价，用卫生的食品袋来包装，10 块钱一袋，20 块钱一袋，分开装，要多少钱的就切多少钱的。’即使以后生意慢慢好起来，他们也从没想过在广州做一辈子。‘广州的生活成本太高，赚几万块钱本钱后就想回家做个小生意。’吐尔逊说。”²吐尔逊已经有了一定的广告意识，但还需要许多文化交融。而如果他满足于“简单赚几万块钱本钱后就想回家做个小生意”的想法，这种商品经营的持续效果将断裂，而在接续上恐怕会落在新的产品后面。由于他们的脱离，这种民族的文化适应也将重新断裂。

城管等政府执法部门，能否认识到少数民族流动摊贩，同汉族特困流动摊贩一样，对一个城市来说属于边缘人群，开动智慧的大脑，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固定经营场所，免除相应的税额，为这类人群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呢？有的学者建议“建设功能创新的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聚集区……一方面围绕人们生活、休闲需要，增加更多的商业、娱乐、交通设施，把当地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品和加工技术组织起来，从事民族工艺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另一方面，引导流动少数民族到商业服务区开展民族服饰、艺术品等传统工艺的生产和销售，让各民族群众共同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商业一条街”³（pp. 60-65）。我们可以设想，拥有了这些良好的服务，切糕门事件还会持续发酵吗？

随后不久，2013 年 1 月 11 日，洛阳市再次发生“切糕门事件”。当日下午 5 时，在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谷水西转盘处，发生拦车强卖切糕事件。售卖切糕者强行拦车后，司机无奈下车询问价格。对方回称：5 元一两，但瞬间挥刀切下 11 斤，共计 550 元。随后有人及时报警，售卖切糕者则电话召集同伙赶到，围堵司机。⁴ 对此事件当地警察称，“事件已经定性，属于强买强卖。”警方也认为，这只是一起社会治安案件。但还是调解结束，司机买下了 100 多元切糕，双方达成和解后自行离开。”从警方对此事的处理来看，这一“切糕门事件”带给大家的依然是

¹ 刁宜豪、贺风玲.我们不是“切糕党”[N].南方周末，2012 年 12 月 13 日

² 刁宜豪、贺风玲.我们不是“切糕党”[N].南方周末，2012 年 12 月 13 日

³ 万良杰.城市流动散杂居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2（3）

⁴ 观察者网.洛阳再发切糕事件：拦车强卖不让走，一刀下去 500 多[EB/OL].[2013-01-14].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3_01_14_120314.shtml

难以认同的情感。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大规模的报道，切糕生意的未来将更是步履维艰，而流动摊贩缺乏帮助，难以溶入新城市，为了生存，走向了公然拦截车辆的强买强卖方向，而这种方式依然能够不受处罚，不得不让人质疑：无处罚，也无帮助，切糕党的未来将继续走向何方？

“切糕门事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场娱乐，也带给我们深入一步地反思：散杂居民族地区如何促进民族文化适应问题，政府在其间的介入作用甚为重要。

参考文献：

- [1] 万良杰, 城市流动散杂居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2 (3)
- [2] 海南网. 16万切糕事件始末
[EB/OL]. [2012-12-05]. <http://www.51taonan.com/page/news/sid/38996/cid/25/id/16890>
- [3] 人民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切糕、切糕, 怎么了
[EB/OL]. [2012-12-05]. <http://money.cnfol.com/121212/160,1538,13921638,00.shtml>
- [4] 黄洪琳, 刘锁群. 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J]. 社会科学, 2004 (5)
- [5] 徐光兴. 跨文化适应的留学生活[A]. 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援助[C].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年
- [6] 环球时报. 维族学者谈 16万新疆切糕案:警方为何支持敲诈
[EB/OL]. [2012-12-05].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21205/17564596.html>
- [7] 栗占勇. 石家庄破获“切糕党” 强迫买切糕不买就殴打[N]. 燕赵都市报, 2009年1月13日。
- [8] 深圳广电集团. 宁波: 小伙买 10元切糕被强卖 160元, 特警没收三车切糕
[EB/OL]. [2012-12-06]. 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2_12/06/19910709_0.shtml
- [9] 董从哲, 山东济南规定再卖“天价切糕” 将被重罚[N]. 齐鲁晚报, 2012年12月15日。
- [10] 高永久, 曹爱军.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 驱动因素与社会效应[J]. 广西民族研究, 2012 (4)
- [11] 天涯论坛. 一个新疆汉族人对所谓切糕事件的看法
[EB/OL]. [2012-12-13].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926043.shtml>
- [12] 记者范承刚, 实习生贺风玲、谢佳熹. 卖切糕的年轻人[N]. 南方周末, 2012年12月13日
- [13] 习宜豪、贺风玲. 我们不是“切糕党” [N]. 南方周末, 2012年12月13日
- [14] 观察者网. 洛阳再发切糕事件: 拦车强卖不让走, 一刀下去 500多 [EB/OL]. [2013-01-14].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3_01_14_120314.shtml

【论 文】

维吾尔族在校大学生对民族诸问题的认知浅析

——以中央民族大学部分维吾尔族学生为例

唐元超¹

摘要：为了展示维吾尔族内心的真实想法，促进族际间有效沟通，笔者于去年11月至今年3月，

选取了中央民族大学20位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获知他们关于维吾尔族、伊斯兰教、

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专业2010级本科生。

中华民族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等诸问题的认知。本文从个案研究出发，对个案进行分析性概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维吾尔族大学生自身呈现出相当的多样性，对待民族诸问题的看法受到学习经历、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大环境影响；维吾尔族大学生对维吾尔族整体民族的社会处境普遍表示失望，其民族自信问题需要引起特别注意；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有特殊重要作用，对待宗教问题要在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前提下引导伊斯兰教的常态化发展；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政治诉求更多体现为追求平等的社会身份，构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需要更加注重尊重各民族平等的社会身份和差异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间的理解和信任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维吾尔族大学生；民族意识；伊斯兰教；中华民族

一、对维吾尔族自身的认知

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往往来源于成员对本民族积极正面的评价。通过访谈，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本民族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豪感和对民族现代化的热切期盼，但大部分学生对维吾尔族目前处境表现出失望情绪，认为其在国家统一的现代化进程中，缺乏进取精神，整个民族“被边缘化”。

（一）“懒”：维吾尔族进取精神弱

笔者选取了维吾尔族的精神品质作为话题。多数学生在访谈中都提到维吾尔族比较“懒”，这种“懒”既是和“勤劳得像一头牛那样”的汉族人比较而言，也是在和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的祖先比较而言的。

编号 02：我们（维吾尔族）肯吃苦、热情、憨厚，还有一点懒。很多维吾尔族不够努力，本来他们是很聪明的，比如别人用一个小时能做好的事，他们可能十五分钟就做好了，可是他们就是不去做，太懒了。我们本来是很聪明的，外国也有这样的评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会不断改变，越来越好，因为情势所逼嘛，都被逼迫去做。

编号 04：我觉得现在的维吾尔族和我们的祖先在精神上是有区别的，他们以前对于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探索，肯吃苦；但现在我感觉有点懒。（怎么会懒呢——笔者问）我认为这是一种绝望，因为他不能有正常的社会流动，以至于使他丧失了上进心。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唱歌

的、跳舞的和作家，还需要很好的民族教育。

编号 13：以前的维吾尔族都是很聪明的，可是现在，我觉得是有点懒，这是我们民族心理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觉得懒呢——笔者问）我觉得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再怎么用力也没有，都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地位，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作为维吾尔族精英分子的大学生也是这样吗——笔者问）大学生，应该要分两类，一是在新疆上大学的，一是在北京的。新疆的那些贪玩，他们从很偏僻的地方来到乌鲁木齐，觉得乌鲁木齐特别发达。他们在那边觉得自己努力最后的结果还是和没好好努力的一样，没有太大差别。就算你很努力，你也很难有好的机会，有更好的工作，干嘛那么努力呢？他们在那边机会少，看的也少，到最后还是不行，还是到处碰钉子。在北京就要好一点了。在北京很多同学都很努力，很勤奋，他们看得多，接触的多，而且出国的机会也很多。

“懒”被很多学生提到，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归因不同，直接影响了维吾尔族学生对维吾尔族整个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预判：（1）将“懒”看做是个别人不够努力，但是凭着维吾尔族聪明的天性，这种情况将逐渐改善，事情会越来越越好；（2）将“懒”看作是民族受挫后的集体表现，是作为维吾尔族个体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流动这一失望心情的体现，就认为整个民族没有希望。前者不会存在较大问题；而后者就会使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加上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偏见、歧视，最终会发生比较严重的事件。

“懒”背后透露出维吾尔族整体的失望情绪，这是其感知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情绪反应。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具备现代化技能的产业工人，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民族的社会分工”需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一个民族的分工发展程度是衡量这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而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这个民族自身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了它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形式和方式，决定了它的阶级关系，决定了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¹而就目前来看，维吾尔族中具备现代化技能的产业工人还比较少，经管类、工程类、社科类的人才还与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不相适应。目前的“民族教育”主要培养民族干部、民族语言、民族艺术等方面的人才，这部分人不是现代产业的创业者，主要靠政府和本民族文化（语言、历史）吃饭，重点在保留“民族性”上。由于“民族教育”缺乏对民族现代化建设性人才的培养，这导致了维吾尔族在从业技能、创业能力等方面受阻，加上汉语水平、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等在现实就业中受限重重，最终难以融入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在现代化中被逐步“边缘化”。²

维吾尔族的这种失望情绪和挫折感直接阻碍了民族进取意识，难以发挥民族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了民族自身的发展；而且挫折感的广泛存在还导致了由官方主导的“民族”、“宗教”舆情宣

¹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5.

² 传统民族教育似乎还带了另外的后果：那些因为接受“民族教育”而保留“民族性”较多的人，本身难以直接促进民族现代化发展，同时其资源的获得也主要基于其民族身份（如“民族干部”），因而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维持、固化民族间的边界，并强调民族性。这自然会部分地引起民族关系紧张，加深民族间的隔阂。

传在普通民众中起负面作用，加深维吾尔族对汉族、对政府的不信任感¹，这将进一步影响民族关系，因此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二）“久”：维吾尔族对历史自豪感的追求

他们对于维吾尔族历史的叙述与国家统一编写的历史课本有较大出入，因为他们还可以通过来源于母语的历史材料获取历史认知。以下是得到的部分回答：

编号 01：我们的祖先一部分是从蒙古高原上迁过去的，就是一部分回鹘人，可是他们到新疆之前，那儿就已经有人了，他们相互融合才成为现在的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人里面（的血缘）是很复杂的，里面有巴基斯坦、俄罗斯什么的，也有蒙古人的，有些皮肤很白，也有很黑的，还有像汉族人那样黄黄的。我们不能说维吾尔人的祖先只有回鹘人。

编号 07：我通过我们母语了解到的历史和你讲的有点不一样。我们书上讲维吾尔族在新疆已经居住了 7000 到 8000 年。当时中亚，包括新疆这些地方，据说都是一片森林和海洋，我们的祖先就居住在那里，后来由于自然灾害，这些地方越来越干旱，海洋也蒸发了，树木被埋在沙漠中，所以现在才有那么多石油。这样的环境没有办法继续生活，所以他们就东迁到内蒙古高原，就是你们历史上记载的回鹘，建立了回鹘汗国，到了 840 年，这边也是自然环境恶化，加上和吉尔吉斯人打仗失败，他们没办法继续生活在这里，于是他们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土地上。

母语材料的历史叙述，强调了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这片土地的悠久历史，强调了维吾尔族在不断迁徙中与当地土著融合的多元族源。其中一位同学向笔者诉说自己“恨透了这个公元 840 年”，因为正史（汉文史料）认为维吾尔族形成于这个时间节点，而在他看来维吾尔族的历史比这悠久许多，只是因为作为“一把民族”的汉族不想承认其他民族比她具有更悠久的历史罢了。²对历史的叙述直接影响了维吾尔族学生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一位学生谈到：

编号 11：我坐火车回家，看到一些内地人也到新疆去，他们是去那儿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内地，我就比较生气。他们为什么要去新疆呢，新疆是我们维吾尔族的，内地才是他们的。也是这个道理，我不想在内陆，因为内地是汉族人的，不是我们的。

历史叙述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现实社会的反应，并服务于现实需要。“新疆是我们维吾尔族的”体现了部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封闭和保守，甚至排外，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下资源

¹ 社会挫折理论认为，在存在社会不信任的情况下，对于挫折感强的群体进行敏感主体的宣传，相反会产生排斥力，难以达到宣传目的，甚至反作用会更大。

² 这是社会挫折理论的直接体现。如何评价一个民族的历史长短，不能只看其先祖的历史，比如如何评价回族历史的长短；840 年确实是维吾尔民族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但在对立情绪之下，部分维吾尔族学生将其作为历史的阴谋。

竞争民族关系紧张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维吾尔族传统社会心理的体现。传统社会将集体作为行动选择的重要标准，¹笔者访谈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普遍将“家庭”作为择业地的首要考虑因素，大都愿意毕业后回到新疆，维吾尔族社会人口流动率极低。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的数据显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维吾尔族的省际迁移流动率仅为0.1%，²而十年后的六普数据稍有增长，仅为0.42%，远远低于同期全国省际迁移流动平均水平。³较低的人口社会流动率使得社会的传统性得以维持，传统性权威具有绝对影响力和控制力，个体选择在社会系统内被设定，不利于维吾尔族内部社会的创新，不利于接受外来信息，不利于社会的互动与整合。

历史的争论难以一时消弭，姑且置而不论。促进维吾尔族社会向现代型转变，培养开放、包容的民族心态，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鼓励维吾尔族个体自主选择应该解决历史争论的途径之一。

（三）“公司”：维吾尔族对民族现代化的期盼

维吾尔族自身渴望现代化，期待在社会中能够创新。他们本身也乐于学习汉语，希望融入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

编号 04：前几天一个外校的学长到我们寝室住了一晚，他和我们说他在一个企业，我特别佩服他，他就像电视里面一样，和我们讲他做的上百万的项目、公司啊什么的，我发现原来我们维吾尔族也有资格讲公司、项目，也有权利讲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样才帅气……我们男子汉嘛，应该学会出去闯一闯，我们应该期待有更好的发展，应该创造新的历史。

编号 13：新疆发展不太好的原因可能是，第一语言问题，汉语不太好；第二就是思想比较保守，不想离开新疆；第三可能是不敢出来闯，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没钱。还有一个就是新疆的民族企业太少了，做的都主要是一些轻工业，比如什么清真食品、化妆品、婴儿用品之类的，销售的范围也主要是在新疆。而且我觉得维吾尔族人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老跟着别人做，没有自己的创新。

虽然憧憬现代化，但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焦虑，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整个民族的发展中去，期待通过民族教育振兴整个民族。

编号 02：我们维吾尔族不是这样（团结），大家相互都不会听对方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一大障碍，需要像你们（汉族）那样。以前我学过一篇课文，它讲的是一群人走到森林里面迷路了，没有了光亮，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把自己的心掏了出来，他

¹ 帕森斯用五个模式变量作为衡量标准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做了明显区分：集体取向—个体取向；特殊性—普遍性；扩散性—转移性；情感性—情感无涉；先赋性—自致性。

² 张善余，曾明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J]，民族研究，2005（1）：17—25。

³ 2010年全国省际人口流动平均水平19.57%，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平均水平为14.04%。维吾尔族不仅省际人

用手举着心，那颗心就亮了，于是大家就跟着他走，直到他把大家都带出森林，带到有太阳的地方。那个人的名字叫“ dangkuo”，我不知道汉语怎么说，我们民族现在就缺乏这个“ dangkuo”。

编号 08：这么多优秀的人都往外跑，不愿意回去，我们民族还怎么发展？我们有 80%的农民，可是知识分子谁去管他们？所以我现在想好了，我以后必须回去，哪怕我就是回去做一个老师，我可以教我的学生好好努力，让他们为这个民族的发展做贡献，每年 30 个学生，一辈子加起来还是很多的。钱学森他们不都是先在国外学习，然后回国效力，才有了原子弹什么的吗？

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大学生认识到维吾尔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缓慢，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对祖先辉煌历史的追忆也不过是在困顿现实中寻求安慰的表现，有调查表明维吾尔族青年的就业问题显得尤为严峻¹。目前，维吾尔族渴望现代化却苦恼于没有实现的路途，希望获得社会承认而在社会排斥中陷入无端的失望。然而，社会承认最终是通过竞争和实力来体现的，“抱怨”和“追忆”不能解决问题，维吾尔族的发展也不可能依靠“援助”就可以实现，而需要从民族内部培养发展动力，这个动力就是产业人员和具备现代发展能力的人才队伍，以此引领现代化和科学精神。挫折感必须靠实力提升消释。发展职业技术和推动理工科教育应该是培养产业工人的重要途径。

二、对宗教的认知

有研究指出“宗教因素而非民族因素是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稳定与发展的核心因素”，²因此研究作为维吾尔族新生力量的大学生对宗教的认知状况显得尤为必要。原有知识告诉我们维吾尔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吐尔文江基于表露于外的行为特征而对穆斯林群体的分类推进了我们对新疆穆斯林的理解。³从笔者接触到的维吾尔族大学生来看，伊斯兰教对于维吾尔族大学生具有重要影响，但他们对于宗教的认知却呈现相当的多样性；无论其信仰宗教与否，都是受到环境影响后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宗教观念基本形成。

（一）伊斯兰教是自我束缚

编号 01：我不喜欢做礼拜，觉得很浪费时间。我刚上大学时，寝室里面只有一个人每天坚持做礼拜，现在有 5 个了。他们经常说我不是维吾尔族，代表不了维吾尔族，连礼拜都不做。可我争辩道“做礼拜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做礼拜”；他们说，这是古兰经上面写的啊，如果不做礼拜，死后要下地狱的。我反问道：“是有人从地狱走出来给你说过吗？”这几年我们没办法

口流动率偏低，本省内人口流动率也不高，仅为 7.67%——六普数据为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整理所得。

¹ 马戎：《新疆对口支援项目实施情况的调查分析》，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47 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

² 严庆：《引导和促进新疆宗教常态发展》，未刊稿，2014 年 3 月。

³ 吐尔文江把新疆的穆斯林细分为四种社会群体：“文化穆斯林”、“世俗穆斯林”、“保守穆斯林”和“极端穆斯林”，参见张弛：新疆——保守思潮的危险信号，《凤凰周刊》，2013 年第 35 期。

沟通。遇到宗教问题我就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应付，但我还是不做（礼拜）。我看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礼拜，做完后接着去睡觉，睡到9点、10点，是不是很浪费时间？要是他们6点起床然后去学习该多好，他们每周五还要去清真寺做礼拜，一个来回就是两个多小时。我喜欢做一个自由的人。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开始不做礼拜，那时候我主要是自己看了一些书，觉得宗教狂热没什么好的。特别是到北京上大学后，我就更加不做礼拜了。

每次回家，妈妈都要求我做礼拜，要我7点起床，可是我根本起不来，也不愿意做，妈妈把我宠坏了，也没办法，只是说“不该把你送到内地，你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爸爸对于宗教的态度比较开明，因为他是初中教师嘛。我二姐是个教徒，她本来是在乌鲁木齐念过大学的，可是后来出嫁了，我姐夫家里宗教很重。她本来有份工作，可是姐夫家很有钱，他就让她把工作辞掉，然后待在家里。其实我很可怜我二姐，因为现在她没有工作了，姐夫也不给她钱，她的地位很低。她还生了一个女儿，现在七岁了。可她公公婆婆把这个小女孩送到清真寺里学习古兰经，他们认为女孩就应该学习经文，不该去学校读书。我认为小女孩很可怜，那么小的年纪就离开父母，需要自己梳头、洗脸，每天很早就起床，以后她的性格肯定要变的，这样不利于她的成长。我爸妈他们看到她那么小能够把古兰经读得那么好，非常自豪，但是他们也不希望她这样。我因为这件事情一直都没和我二姐打电话，不喜欢他们那样！

我觉得每天那样做礼拜很不自由，我敢说我现在只相信科学了。我觉得人一生很短暂，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死了之后的事情再说吧。我觉得这样想也是对的。所以我希望以后能去乌鲁木齐工作，那边宗教氛围开放些，生活条件也更好。

编号01来自兵团家庭，虽然是“民考汉”学生，但其汉语水平较高。他描述了作为维吾尔族大学生选择不信仰伊斯兰教面临的各种压力，在学校主要来自同辈群体的舆论压力；在家里则主要来自家人。要想摆脱这种群体压力，除了“遇到宗教问题保持沉默”以外，还要改变原有的交际空间，他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寻找新的同辈群体以减轻失去穆斯林群体的精神压力，如参加学校社团活动、结识其他民族的朋友、待在图书馆等；同时他日后离开学校还需要远离宗教氛围浓厚的传统社区，去一个开放、包容的地方。他选择不信仰伊斯兰教来源于自身经历，认为伊斯兰教是对自我的束缚。然而，事实上能够选择“只信科学，而不信教”并且坚持下来的人极少。从

他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他周围的同辈大学生，还是对其家人，伊斯兰教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伊斯兰教的**最大特点是自由**

编号 03：在这些群体的分类中（维吾尔族、中国人、穆斯林），我首先属于穆斯林。我对宗教的信仰不是因为父母的遗传，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最终选择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以前在新疆，因为周围的人都信教，使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跳出来思考，于是更加坚定。在伊斯兰教里，所有人，不分民族、种族和肤色都是平等的，而且他给你提供了奋斗的动力，我觉得很重要。当然，我不否认从小生活的环境对我的影响。伊斯兰教是很包容的，接纳任何人。

编号 03 在珠海上了三年高中，自述珠海是一个“氛围比新疆好很多”的地方，在那儿学习后，使自己“思想更加开放”，摆脱了在新疆做一只“井底之蛙”的命运、“使自己有了更多选择，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自己首先属于穆斯林，不是家庭、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恰好是基于自我选择的结果，“维吾尔族”、“中国人”这些群体身份都是与生俱来、别无选择的。他追求平等和自由，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无疑是最能实现他的目标和最能给他希望的。

（三）伊斯兰教是**个人奋斗的动力**

编号 04：（信仰伊斯兰教）是我自己的选择。很多人认为在穆斯林家庭出生的小孩一出生就是穆斯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在上高二以前，因为到了内地，没有人管我，我直接放弃了做礼拜，那时候感觉自己很自由。我看到别人都在玩儿的时候而我在做礼拜，那样显得很傻。在家里，我只知道作为穆斯林要做礼拜，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高二以后，我接触到一些新朋友，都是内高班的，他们给了我一些书，然后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伊斯兰教，看到了这个宗教的好，认为伊斯兰教值得学，也应该学。我大一刚来时，每天都做五次礼拜，别人看到我，都觉得我在宗教上很虔诚，认为我做礼拜导致上课迟到、成绩不好，耽误了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之间完全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我觉得正是由于自己宗教信仰不虔诚，才使我成绩不好。因为如果信仰虔诚，就会给你努力的动力，也会让你内心变得平静，获得很多安慰。大学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开放了，对非穆斯林的态度也有很大改变，我在生活习惯方面也有了一定变化；我能够在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上找到平衡。其实每天做礼拜、每年一次的封斋，做这些功修花不了多长时间，每天

五次礼拜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我以前之所以学习成绩不好，不是由于做礼拜耽误了时间，而是我到了大学就放松了，每天上网、打游戏，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一些人宣传宗教信仰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但这不一定。信不信宗教都有可能幸福。但是如果你信仰伊斯兰教，了解它的内涵，并按照真主的旨意去生活，你就会在后世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我自己理解，一个人因为没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条件和环境而没有选择伊斯兰教，真主是不会怪罪；只有当你有条件而不选择的时候，你才会被惩罚。

编号 04 同样是在内地（南京）接受的高中教育，他自述在新疆时“对汉族没有任何接触和了解，只听北疆的同学说起过”；在南京时，“由于学校的封闭管理，使自己和当地人接触不多”，他信仰伊斯兰教历经了一个“家庭影响而自然跟随”——“无人管束而自我放弃”——“受人影响而自我选择”的过程。经过这一转变过程，他变得更加坚定而理性。日常中，他乐于向有兴趣了解宗教的人讲解伊斯兰教，改变了他原来认为信教的人比不信的人更加“优越”的想法。他多次提到在家看正规出版的宗教刊物也会被没收，表示如果用强制手段让他放弃宗教信仰，则会取得反面效果。

（四）伊斯兰教是维吾尔族发展中信仰的宗教之一

编号 05：我永远不会把宗教放在第一位，我首先是一个维吾尔族，其次才是一个穆斯林。

在维吾尔族历史上，我们信仰过佛教、摩尼教、萨满教，信仰伊斯兰教不过一千多年的时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祖先不是穆斯林，就否认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虽然没有信仰伊斯兰教，可是他们依然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文化。但是我觉得伊斯兰教对我们现在来说依然很重要。伊斯兰教提倡的是和平、相互帮助。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认为伊斯兰教是恐怖主义。像中东那些伊斯兰教，其实我也不太喜欢，他们没事找事，残杀无辜的老百姓，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完全不符。几乎所有读过《古兰经》的人都说好。

编号 05 虽然也信仰伊斯兰教，但他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从维吾尔族整个历史发展脉络中将维吾尔族和伊斯兰教分别考虑，而且对于伊斯兰教的主旨有自己的理解，区分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同时作为共产党员的他自述可以个人调整共产党提倡无神论和伊斯兰信仰间的“小矛盾”——那就是“把真主放在心里就好了”。

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社会中具有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宗教权威对于维吾尔族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这是新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容回避的问题。访谈中，维吾尔族大学生普遍表示北京的宗教氛围比新疆宽容，而新疆对宗教信仰管理太过严格，没有很好地执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新疆的这一行动极易被维吾尔族大学生理解为针对维吾尔族本身的打击和同化，从而导致对政府的反感、不信任。在当下中国，如果把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从而不加区分

地予以打击，导致人们无法从正规的宗教中获得宗教信仰的需求满足，这就为“灰色”宗教、“黑色”的宗教极端势力提供了生长空间，助长了宗教的非常态发展¹。维吾尔族大学生具有正确解读伊斯兰教的能力，他们是抵制宗教极端势力渗透的重要力量，需要积极争取和引导。对于新疆的宗教管理，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引导和促进新疆宗教的常态化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宗教人员，以宗教自身力量影响、争取信众，满足人们正常的宗教需求，挤压非法宗教的生存空间，积极引导信教人们为社会建设与和谐稳定服务。

三、对中华民族的认识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新疆”、“维吾尔族”经常与“分裂”、“暴乱”、“恐怖主义”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最近的几起暴力事件也不断挑动着国人的神经。²出于对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考虑，一些学者或是疾呼“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马大正，2002），或是高喊“民族问题去政治化”（马戎，2004），或是直接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设想（胡鞍钢、胡联合，2011）。新疆或者说维吾尔族到底有否“分裂的危险”？他们是否认同“中华民族”？很多研究从定量测量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然而，从笔者的访谈情况来看，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不能简单地用“认同”或者“不认同”加以区分，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具有不同的面向和层次，对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界定影响了这一问题的回答。他们的认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以政治边界确立的中华民族

第一种类型认为中华民族是由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所规定的，尽管各民族之间历史文化存在差异，但是共同生活在中国这一政治事实需要得到尊重。中华民族统一性的维系既在于尊重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又依赖于现实生活中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真正落实。中华民族这一政治属性决定了它具有对内代表 56 个民族，对外代表整个中国人民两种面貌。

编号 03：如果说它（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那么 56 个民族是什么？中华民族如果指称全国人民的话，那里面汉族占了绝大多数，本质上还是一个汉族的东西，给人感觉就是要用汉族去同化其他民族，这样我是不能接受的。拿我来说，我首先肯定是一个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和汉族本来就是两个文化、历史完全不同的民族，这要尊重历史，不能瞎编；到了现在两个民族生活在一起，那就应该你不欺负我，我不欺负你，民族之间平等，该帮助的就帮助，一起好好生活，这是尊重现实。所以我觉得提“中华各民族”比较恰当。在世界上宣称“中华民族”没有问题，那是对外的；但是在国内，各民族之间还是不一样的，应该叫做“中华各民族”。

在他们看来，挑战中华民族统一性的是政策宣传和实际执行的差距，这种差距造成了民族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抱怨，少数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排斥。这一认知类型认为以政治边界确立的中

¹ “宗教非常态发展是指宗教活动偏离了宗教信仰的正常功能，超出宗教影响的应然范围，进而违反国家宗教政策和宗教事务管理法规，甚至成为破坏社会安定团结、侵犯他人权利的动员工具和组织纽带。其具体形式有“三非”（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网络传播）、宗教极端主义及其行为、正常的宗教声音和影响势弱等。”——引自严庆：《引导和促进新疆宗教常态发展》，未刊稿，2014 年 3 月。

² 主要天安门金水桥事件、4·23 巴楚事件、昆明 3.01 事件等。

华民族需要在政治上给予边界内（中国领土范围内）每个民族同等的社会地位，保障各民族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真正落实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

（二）内部多样文化的中华民族

第二种类型侧重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属性，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文化多样的统一体，反对文化同化，提倡文化多样性。如果不承认文化多样性，那么“中华民族”就只是汉族的别称，如此则难以被认同。

编号 07：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伪概念，就是为了一种政治的需要，为了统治的需要；本来没有的，为了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而提出来的。我不同意把 56 个民族“融合”到中华民族里面去，我觉得文化的多样性是应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就算表现得过分了也没有关系，也是应该被允许的。像美国那样，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文化，黑人有自己的文化。不能说和主流不一致就是分裂分子。我也认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统一的目标、愿望，在这方面要保持一致，这个很重要，方向还是必须要有。这个方向就是民主发展的方向、政体什么的。但是国内每个民族的文化、教育、历史是应该允许有差异，想要用这个概念去磨灭各民族的历史记忆是不可能的。

在他原本的理解中“中华民族”带有民族“同化”的含义，因此他表示坚决反对；但他同时承认一个国家需要具有统一的意志和目标，“统一的政治目标”和“多样的文化景观”可以并行不悖。一些人从历史叙述方式中批评中华民族以偏概全，主要叙述汉族历史，对少数民族不公，认为“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磨灭少数民族历史的有效叙述工具。尊重各民族多元历史叙述，保障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权利，“政治一体，文化多元”无疑是对他们心目中的中华民族的最好诠释，对这些维吾尔族学生而言，文化的多样性也包括宗教信仰的多样性。

（三）平等公民社会身份的中华民族

第三种类型是关注中华民族的社会身份属性，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公民，对外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追求社会身份的无差别待遇。

编号 09：我要去泰国（做汉语志愿者）之前，我爸爸专门打电话过来给我说：“孩子，你現在要去泰国了，你不是代表维吾尔族去的，而是代表中国。去那边，他们可能会问你关于‘七五事件’之类的，你不要抱怨中国，有什么在国内说说就好，不要去国外说。”我当时就被我爸爸这种意识所感动了。我爸爸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竟然这么爱这个国家，这么关心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我特别感动。在泰国那边，他们不会把我们看作是很低级的，像垃圾一样的，我觉得很高兴。我在那边就是代表中国，我觉得很自豪。你说，在中国，除了我们民族大学，这么平等地对待各个民族，还能那么便利地给我们提供出国的条件，其他地方会这样吗？我们少数民族

会有这样的待遇吗？

编号 12：我在泰国那边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特别自信，(在国内)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优势。我去给他们教汉语的时候，我主要用英语，然后夹杂一些泰语。在当地我也学一些泰语，我就用维语字母把这些音都标出来，他们看到了以后，就问我这是些什么文字，我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母语。他们说一看我长得就不像中国人，我给他们讲，我是中国人，不过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我拿出地图指给他们看，新疆，我的家乡，他们就明白了。我还告诉他们我是穆斯林，去清真寺念古兰经的时候，要用阿拉伯语。在他们看来，我既会自己的母语，又会汉语、英语，还会阿拉伯语和少量的泰语，我有这么多优势！我还给他们表演维吾尔族的歌曲和舞蹈，他们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他们觉得中国人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想在这边，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多好啊！可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不管你会多少种语言，如果你不会讲汉语，那你就什么都不是，甚至连猪都不如！¹

编号 08：每天都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党，可是他们都没有真正接纳我们，我要去住旅馆、打出租车，都遭到排斥。我们给钱啊，又不是不给钱，你说这样的国家，我们怎能还能在里面好好的生活？

这部分学生给笔者讲述了很多他在国内遭受的民族偏见和歧视待遇，包括在生活中很多人将其当作“小偷”一样防范，或者把他看做“恐怖分子”。他们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认为现在提倡的“中华民族”没有真正体现每个人的平等，只是假大空的政治宣传。

编号 11：我在北京要是迷路了，想在路上找个问路的人，他们就什么都不说，直接走开；要是你在路上碰了一下别人，他们就特别害怕，然后紧紧地看护好自己的钱包之类的，生怕你是小偷。我上次在地铁上，一上车，他们就目光瞪着你，然后捂住自己的包。如果你在上面接一个电话，他们一听是维语，立马就往一边钻，就像挤什么似的，迅速离开你。去逛商店，你一进去，

¹ 2012年暑假，中央民族大学与泰国教育部方面达成协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派出上百名汉语志愿者到泰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汉语教学活动，本次志愿者都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英才”成员，包含各个民族和各个专业，这两名维吾尔族学生即为本次志愿者之一。

他们就用手捂鼻子，好像是我们身上很臭似的。这样的待遇我们真是受不了。我也承认，我们民族中有一些小偷，就是这些小偷，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这是他们对我们的偏见。

对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一直是民族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现实中生活在国内的人们通常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当遭遇外界逼迫，少数民族学生下意识的反映为“民族同化”；而上面案例中去到泰国的编号 09 和 12，其“中华民族”意识自然树立——这说明“认同”具有强烈的场景性，自我归属具有很强的伸缩性。理论上定义民族可以将民族看成是边界清晰、内部同质的人们共同体，但在社会生活中民族间的边界并非如此清晰和不可变动。维吾尔族虽然其体貌特征明显、文化与内地相较异质性强，但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也正在逐步走出“共同的地域”，也在学习使用“共同语言”以外的语言，其“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在发生变化，以上访谈透露出维吾尔族大学生既不希望“中华民族”变成同化各民族的工具，也不希望自身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占据着我国国家建构的话语论述中心；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非但没有随着全球化而逐渐冷却、消解，反而不断升温，依然是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多族体形态的传统国家形式后，在清末与西方现代的民族国家形态相遭遇，一直在寻求“天下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通约之路，而“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一再被知识和权力的话语诉说。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了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始终是“多元”与“统一”之间相互平衡的过程，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历史的发展脉络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于民族间各种方式的社会互动，中华民族的觉醒在于与外部他者的比较和抗争中催生的边界。这与实际访谈的情况相符，无论是对中华民族的哪种认知类型，他们都希望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各民族，允许各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化，在社会上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和地位。挑战中华民族统一性的不是各民族的差异性，而在于保持中华民族统一性时是否尊重了各民族的差异，是否给予了各民族平等、自由的权利。目前民族理论界围绕着“二代民族政策”展开的激烈争论，其核心在于中华民族的建构是选择“合”还是“和”的道路问题。前者表示利用国家机器加强统一性建设，尽快实现各民族的“大一统”，避免国家分裂；后者则是尊重差异的基础之上塑造统一。

事实上，这些维吾尔族大学生并非“否认中华，再造国家”，也并非固步自封，只愿意在自己的民族圈子里，相反他们希望能够以自由、平等的身份进入整个国家的发展步伐，社会权利而不是政治建国才是他们真实诉求。采取行政措施促进中华民族快速整合可能走向反面，结果事与愿违；同时，如果用行政措施固化民族边界，阻碍民族间的社会交流，或者在体制上制造民族交流障碍也不符合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建构中华民族更应该侧重于各民族平等的政治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给予其更多尊重和理解。

四、对民族政策的认知

民族政策是指国家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规范国内民族关系而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措施、办法、条例等的总和。在我国，民族政策一般指国家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历史的不断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体系结构，即“核心政策——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政策、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尊重少数结成统一战线政策；具体政策——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

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具体政策、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民族乡政策、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政策、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政策、民族地区环境保护政策、少数民族人口与生育政策、少数民族就业政策、少数民族科技政策、惠牧政策、民族利益协调政策等。”¹ 本次访谈对象基本上肯定了我国民族政策的顶层设计，认为其对于民族关系的调节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表示民族优惠政策在基层落实不足，维吾尔族学生尤其关注双语教育政策，新疆目前的民族不信任也主要是由民族政策执行而引发的。除了政策执行，民族政策应该更多吸收治理对象的意见，强调多主体参与。

（一）民族优惠政策在基层落实较少

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论述，我国给予了照顾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但在一些学生看来，很多优惠政策在新疆根本没有执行过，当地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主要采取政治压力的方式，以维稳为最终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优惠政策的不落实直接导致了民族间的相互抱怨，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也源于此。

编号 17：政府给了人民太多承诺，但是兑现的极少。你比如说“两少一宽”政策，我在新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过，后来是听大学同学说的。这一政策就有很大的迷惑性，本来没有在具体中实行的东西，在汉族看来就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纵容，很多人因为自己的事情对社会不满，他就需要发泄，这种情绪引来很多人的跟随，从而转嫁到少数民族身上，就会变成一种歧视。

编号 20：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讨论哪些民族政策好，哪些不好，其实我觉得很多政策根本就没有执行、没有真正落实，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比如民族区域自治，我觉得新疆和一般的省份没有什么区别，哪有自治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北京这边办一个护照，用了两个月时间，可能是比一般人要长，其他人估计两个星期就拿到了。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如果是在新疆可能花十万块钱，都不一定能拿到。在新疆，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保障。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条例，从1984年就提出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制定出来。所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没有惩罚措施，要是有人违反了这些基本条例，他不会得到任何惩罚。

编号 04：我反对民族照顾政策。这就是我们民族政策中存在的很大问题。比如高考加分政策，我觉得就应该取消，这种加分实际上是对弱者的一种歧视，都不是同情了。作为弱者应该想的是更加努力，而不是被照顾。照顾政策会使人努力的积极性降低，也没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少

¹ 余梓东.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与集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1 (06): 14—21.

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距应该靠努力去克服，而照顾就会形成懒惰，就成为不努力的借口。而且，我觉得差异就应该让它存在，只要一切是公平的就可以接受。90分就是90分，30分就是30分，一视同仁。取消照顾政策，可能短时间会产生影响，很多人上不了大学，可是长时间就会让人汲取教训，就会更加努力。现在很多汉族认为少数民族照顾就是共产党把维族看的比汉族地位高，是对汉族的歧视，而维族还不识好歹，还要闹事，简直野蛮。但其实政策照顾和发生事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初衷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但它现在似乎面临“两面不讨好”的窘境：一方面少数民族觉得没有真正得到优惠；另一方面汉族觉得受到了“逆向歧视”。访谈中，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于我国民族政策的设计理念和具体做法都表示认同，但一般都坦言“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可是到了地方就变了样”。这说明我国的民族政策需要在进一步落实中得到加强。

（二）“快速型”的双语政策诟病较大

维吾尔族大学生肯定汉语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对学习汉语表示欢迎，但目前的双语政策呈现“快速型”，缺乏将母语和第二语言统一起来的机制，大部分学生表示现在的双语实质是“汉语教育”。

编号 01：对于“双语”教学我很欢迎。暂且不说汉语是国家通用语，生活在这个国家，不懂汉语不行，而且我们的信息获得，很大一部分都是汉语，懂汉语才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强调首先要学会自己的母语，因为母语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丧失了母语，一个文化的核心就会被逐渐瓦解。现在的双语政策没有一个过渡。我打电话给我弟弟，他现在正上初一，他给我说，你快回来吧，快回来教我汉语，我跟不上。因为他小学一直是学的维语，到了初中所有课都换成了汉语教学。没有过渡，让孩子们很难适应，他们就产生厌学，这就会造成他们一听到汉语就反感、厌恶，这会带来对汉族的不满和反感。

编号 06：我们那边现在不允许开办纯维语的幼儿园，连幼儿园都是汉语的。我觉得政府应该让人民自行选择，他如果非要推行汉语的话，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让百姓看到好处，我想百姓自然知道怎么去选择。

编号 09：保留民族特色可能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一方面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风俗

习惯，这是我们的优势；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存在语言障碍，毕竟不学习汉语，还是不行。我不是那种光知道母语就光荣得不行的那种人，一些人只学习一种语言，汉语说得不流利。但是我又赞成完全汉化，像现在的双语教育，说是双语，其实只是汉语，这是大汉族化啊。

语言不仅是工具，有时更代表着忠诚。因此语言选择不完全是一个理性行为，它带有很强的情感因素，这种情感因素无法从实用主义角度去理解，无法责备和逼迫，只能理解和尊重。从访谈来看，大部分维吾尔族学生对自己可以流利地使用汉语表示自豪，但是谴责那些忘掉母语只会汉语的学生（主要是民考汉的学生），而民考汉的学生对于自己不太了解本民族语言、文化则表示“遗憾”和“惭愧”，这部分人在本民族获得的信任度也不高。

（三）民族间的不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主要体现

很多人表示新疆目前民族关系比较“危险”，在那儿生活比较压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民族间的不信任，相互不了解，缺乏可以作为中立沟通载体的个人和组织。

编号 05：维吾尔族和政府，双方都在指责对方，从来都不反思，这就没有改变的可能。现在有很多想法，尽管都是合理可行的，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没办法实行。我们需要民间组织，站在中间，尽量拉一些人进来，使两个极端的人都相互妥协一些。我觉得像你这样去倾听，有人去听，就是一种突破。民族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文化自觉，因为相比其他民族，本民族更加了解自己的民族，这样处理问题相对容易，所以需要给民族一些权力。

编号 03：第一重要的继续推进民族平等团结，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因为就我成长的环境来看，民族问题很重要，这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有了这个，就不会需要第二个“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因为只要民族团结做好了，相互信任了，百姓会自动反恐，不需要巡逻，一旦发现有恐怖主义分子，百姓打个电话给你，你就直接过来就可以了

编号 13：在新疆，如果你去汉族的商店，你用了维语，不管你说的什么，他就会和你吵起来，说你在骂他——我知道这是他们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在新疆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你到那边去旅游还好，因为你是带着钱过去的，都很欢迎你，但是不会接触这些现实问题。汉族中有几个是真正了解新疆的？像你这样，我其实很乐意和你聊新疆的问题。我遇到太多人对新疆有很大的偏见，起初我想去解释，现在，只能是他们爱怎样想就怎样想吧，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很多时候

不愿意提及新疆的问题,你可能觉得那是我们怕惹事,可主要还是因为那样会感觉是自己在诉苦,在把自己感觉很伤心的话拿出来,这样对自己的伤害其实更大。7.5事件以后我们都不愿意提起,这个事儿很多人觉得我们终于出了一口气,只知道维吾尔族人拿着棍子敲人家脑袋、拿着石头砸别人房子、拿着打火机烧别人汽车,可是最后吃亏的还是维吾尔族人。大家光知道7.5,不知道7.6,7.7还有7.8,以及这几年对维吾尔族人的敌意。7.5以后,很多无辜的人都被抓走了,一下子消失了很多年轻小伙子,很多幸福的家庭都毁灭了。大家都变得悲伤、冷漠,不愿意提起。很多母亲都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

编号 14: 政府经常在指责西方国家双重标准,我觉得中国本身也是双重标准,比如在新疆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就被定为恐怖主义,而在杭州什么地方发生这样的事,就只被看成刑事案件。民族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是会通过代代相传的,比如从小就被告诉别去买这个民族的东西,他们很坏之类的。现在新疆存在这些问题,一是不落实现有的民族政策,二是民族间相互不信任,三是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族大学生普遍表示北京的汉族人比新疆的汉族人“素质高”、“更好”,这应该是新疆民族关系紧张的反映,他们往往认为汉族是新疆的外来者,与他们存在直接的利益竞争关系,其就业、环境、资源等问题都直接归结到这些“外来者”身上。

编号 01: 我在新疆其实接触的汉族人很少,可能只有几个,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素质都很低,很坏。北京这边的人素质很高,没有那样的。但是可能就像你说的,每个民族都有坏人,只是我在新疆没有见过好的汉族人。

编号 16: 我坐火车回家,看到一些内地人也到新疆去,他们是去那儿待一段时间赚了钱再回去内地,我就比较生气,他们为什么要去新疆呢,新疆是我们维吾尔族的,内地才是他们的。

编号 07: 以前毛泽东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吗?现在不怎么说了,为什么在报道恐怖主义的时候都不想想他为什么白白去送死啊!他也不是傻子啊!他自己拿着菜刀进入公安局,那些人都是有枪的啊!难道他们不知道菜刀打不过手枪吗?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家

庭、有老婆孩子，为什么就要去做恐怖主义分子啊？毛泽东还有一句话“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现在前面的那半句没有了，只剩下后面半句话了。

每个民族都分为不同层次，而流动人口大多为民族社会底层，都是为了“讨生活”，加上资源竞争、就业等问题，维吾尔族对新疆汉族（假想的外来掠夺者）心生抱怨，这是素质低造成的不是民族政策造成的。基层政策执行者由于自身素质、办事能力和自身利益等，不能切实贯彻中央的民族政策，引起民族间的不满。

五、思考与总结

中央民族大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一批少数民族高等学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人才培养方面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族体整合建构工程上的具体体现，是各民族间、民族与国家之间互动的集中场所；因此，可以把中央民族大学作为认识新中国民族理论运用与民族政策实践的一把钥匙。同时，社会化相关理论认为，个体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其在青年时期所面临的各类条件的反映，即青年时期是个体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奠定了其一生社会行动的价值标准。中央民族大学的维吾尔族在校大学生对于认识和预判维吾尔族社会状况有一定代表性。通过访谈，了解了部分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于维吾尔族自身的评价、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对中华民族和民族政策的看法，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维吾尔族大学生普遍感觉尊严缺失，民族偏见严重，缺乏民族自信

维吾尔族大学生从自身经历的歧视谈起，表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维吾尔族尊严缺失，他们对未来社会中维吾尔族的发展缺乏自信。就笔者观察，目前经过昆明3·01事件后国内对维吾尔族的偏见变得更加严重，维吾尔族在内地生活将面临更多社会困境；在新疆，大学生们普遍表示生活压抑、不太自由，这导致他们看不到自身发展希望，对未来抱有悲观、失望的情绪。

保证个人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维持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方式；而保证一个民族正常的社会流动则是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一些维吾尔族大学生表示自身就业困难“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言下要追问的就是“如果我们（维吾尔族）汉语水平都提高了，就可以找到工作了吗”。如果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维吾尔族丧失了民族自信，那么中华民族的自信将不完备，国内的极端事件会层出不穷，因此应该重视维吾尔族民族自信问题。从访谈中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大学生和各民族大学生一样，都追求自由、崇尚进步、心怀梦想，他们都是祖国事业的建设和接班人。要解决民族自信问题，从社会结构上，要破除以民族划分的体制性障碍，创造有利于各民族发展的社会条件；从民族教育中，要为学生做更加细致的思想工作、更多培养具有现代发展能力的人才，为其通向梦想扫清心理障碍、技能障碍。

（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引导宗教常态化发展

从选择信仰宗教的经历来看，维吾尔族大学生受同辈群体的影响比受家庭因素的影响更大，这一方面是学生在校的时间长于家庭的缘故，另一方面还因为青年人的成长过程是“推倒权威”、“离经叛道”的过程，青年人不喜欢传统的一切束缚，包括家庭的、宗教的；随着逐渐成熟，其思想意识趋于稳定和理性。无论是否选择信仰伊斯兰教，其自述的基本理由都是“自由”：如果认为伊斯兰教是束缚，则不选择信仰；如果认为伊斯兰教可以自我选择，本身就是自由的体现，则选择信仰。因此对于宗教问题不应该用强制手段要求其“信或是不信”，而应该在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学生对宗教形成正确理解。

伊斯兰教对于维吾尔族社会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这种影响力

不会消失，因此对待伊斯兰教急需刚性手段（打击“三非”、极端势力），也需要引导和培养正规宗教，提高宗教人员素质，争取信教群众，引导正确理解宗教教义，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服务。

（三）建构中华民族应该更加侧重于各民族的社会地位

建构中华民族可能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继“二代民族政策”以后，胡鞍钢等又提出“中国梦的基石在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建议“采取非政治化和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淡化国内公民的民族（族群）身份标识，不再在身份证件等标识民族身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国通用”。¹其想要达到目的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具体操作和思路显得过于“急躁”。且不说对于体貌特征明显的维吾尔族等群体，其“民族（族群）身份标示”是否说淡化就能淡化，就笔者访谈的情况来看，维吾尔族大学生并非自绝于人，并非拒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非铁板一块，只有民族，没有国家。他们担心的恰好是本民族在中华民族中没有得到平等的体现，对中华民族目前的历史叙述有来自母语材料的“反对意见”，因此很难与其达成一致。中华民族的历史叙述应该更加注重历史上各民族交往、融合、变迁的历史，而不是强调某一民族，或“分族写志”，固化民族边界。

除了民族历史叙述，建构中华民族更应该侧重于社会地位。不少维吾尔族大学生对于维吾尔族遭受的歧视和偏见待遇极为不满，其社会身份的平等性受到关注。这方面主要是公众接受片面信息过多而缺乏正确认识。目前对维吾尔族的宣传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媒体经常报道的负面信息，二是舞台上维吾尔族的歌舞表演。但对于维吾尔族真实的生活场景表现太少，与人们心意相通的人和事太少；民族政策的宣传上“讲政治、讲原则”的太多，“讲感情、讲尊重、讲理解”的太少，这样让大众难以理解，理解了也难以接受。因此还原各民族社会生活现实，有利于各民族相互了解。

（四）促进民族间沟通、理解和信任是当下和谐民族关系的迫切需要

谈到民族问题，最容易出现的论调是民族间的相互抱怨：汉族抱怨少数民族“不识好歹”、“野蛮落后，不明事理”，少数民族抱怨汉族“大汉族主义”等，政策上讲的“三个离不开”，现实中变成了“三个不理解”。但正如一些维吾尔族大学生表达的那样“抱怨不能解决问题”。从笔者的访谈来看，维吾尔族与人沟通的愿望强烈，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和他们一起探讨民族问题，哪怕是最为敏感的民族冲突；然而这样的人很少，这样的条件也不具备。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制度设计造成了除了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民族二元格局”，而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缺乏民族间沟通机制设计，缺少作为媒介的中间团体。当下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需要更多发挥社会力量，从社会生活层面展示各个民族的生活图景，增进各民族的了解、沟通、理解，最终达成民族信任。

从社会变迁角度看，现代化即从传统走向现代²，是所有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目前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既想实现现代化而又不想丢失民族特性。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显得尤为焦躁，知识储备和社会经历³告诉他们实现民族现代化才利于民族发展，代表国家权威的“中华民族”虽然是现代化的催动力量，但对其而言毕竟是外部力量，其内心存在“被同化”的忧虑；伊斯兰教是整个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其对于现代性的生长和本民族的社会融入又显得力不从心。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物”的现代化，包括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更需要“人”的现代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经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现代人格、现代品质。维吾尔族应该也必须历经这一过程。

¹ 胡鞍钢、胡联合. 中国梦的基石在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J]. 清华大学学报, 2013(4):111-116.

² 尽管对于什么是“传统”和“现代”还存在较大争议，但无疑二者存在较大区别；需要“现代化”是无疑的。

³ 这种社会经历主要源于与国内其他民族发展程度的对比。

参考文献

- [1]金炳镐, 2007,《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马戎,2004,“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 [3]胡鞍钢、胡联合, 2011,“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 [4]周平, 2010,“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03):85-96.
- [5](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2013,《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6]胡鞍钢、胡联合, 2013,“中国梦的基石在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清华大学学报》2013(4):111-116.
- [7](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2.
- [8]严庆,“引导和促进新疆宗教常态发展”(未刊稿),2014.3
- [9]吴楚克,“从社会分工角度看中国民族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民族报》2012.5.24.
- [10]马大正,2002,《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11]郝时远,“关于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五“(中),《中国民族报》2012,4.20.
- [1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31.
- [13]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1):122.
- [14]兰林友,2003,“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3(03)。
- [1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同政治与左翼”(周红云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02)。
- [16]姚学丽、孙秀玲,“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新疆社会科学》2009(04)。
- [17]何峰,“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途径与方法探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36-40.
- [18]陈万柏、朱秀琴,“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研究综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04):47-50.
- [19]龙玉红、段涛涛,“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现状调查研究——以新疆师范大学民考民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12(06):120-123.

【网络文章】

民族融合须文化先行

葛剑雄

搜狐文化《中国认同 名家访谈》第一期:

<http://m.sohu.com/n/401909015/>

【提要】今时今日，中国面临着各种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周边日本、韩国、越南与中国的纠葛与争端，内部西藏、新疆、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敏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一切的问题都指向“中国认同”：周边国家的中华文化认同、内部民族的国家认同。在漫长的历史分分合合中，一次次的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今日的“中国”，“统一”与“分裂”历史交替中，不同的政权下，各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如何认同“中国”，在学者葛剑雄看来，大有不同。

【嘉宾介绍】葛剑雄，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长达二十余年。代表作品：《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大一统”是一个变动的复杂的观念

搜狐文化：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

葛剑雄：最早“中国”这两个字只是指很多居民点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国君所住的那个城就叫“中国”，后来逐步扩大。比如说商朝的国君居住的地方就是“中国”，到东周礼崩乐坏后，大诸侯慢慢地都把自己住的地方称为“中国”，到秦朝逐步成为了一个政权统治范围的代名词。所以它的形成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又逐步发展成民族的共同体，而且族群的共同体就指华夏，华夏以后的汉族住的地方叫中国，相对的，周围蛮夷住的地方就不能叫中国。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就是说，华夏文化、汉文化传播的地方就是中国。比如说，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大部分都认为自己是中国，越南特别是越南北方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小中华”或者“南天中华”。相反，当时不在汉字文化圈的一些边疆地区，就不被认为是“中国”，自己也不以“中国”自居。

所以，“中国”它最早是一个政治概念，逐步也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族群的概念、地理的概念。地理的概念相当于“中原”。明清时期，从大的方面讲，“中国”就是指王朝统治的地方，但清朝往往把周边也看成是中国的，所以这个概念并不是严格的。真正成为一个比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应该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开始简称“中华”、“中国”，后来逐步统一以“中国”作为简称，这时候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了这一名称。

搜狐文化：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人思维里会有根深蒂固的“统一”观？

葛剑雄：其实现在人的“统一观”并不是一开始的统一观念，基本上它只是存在于狭义的中国范围里。比如说孔子时代强调“夷夏之辨”，“统一”实际上是指统一夏，而不是指统一夷。后来统一往往有王朝自己本身的地方，比如汉朝从来没统一匈奴，甚至匈奴投降以后还“天子不臣”，把它的位置放在诸侯之上。历史上，所谓的“大一统”往往是不包括周边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即使到了清朝初年，好多少数民族地区都还没改土归流，对清王朝来说，少数民族只要服从就行。一般人认为的“大一统”观念，并不符合当初历史上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历来就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我的，要统一你都是可以的，而且都是应该的，只是条件还不具备或者说没有必要，因为你们还太落后、没有开化还不配做我的臣民。

这两方面其实反映在统一的矛盾上面，比如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多数历史书都说，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这其实不符合史实，宋朝统一的地方只是中原，没有包括唐朝的全部。连传统的中原都没有能完全统一，譬如今天的北京，成了辽朝的南京。又比如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化，很多人头脑里是不包括其他文化的，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实际还是局限于华夏（汉族）文化。我们历来所谓“大一统”的观念，从本质上讲只是华夏地区，只是汉族地区，并不是真正的大一统。另一方面又错误地把整个天下都认为是应该由我来统治，我是天下的共主，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观念。

搜狐文化：“统一”从制度上看有哪些好处？从文化上看有哪些隐患？

葛剑雄：统一的一个好处是有利于抵御外敌。历史上中原地区多数时期因统一形成一股巨大的能力，北方的游牧民族，最早的匈奴，以后的女真、蒙古，平时骚扰你一下，中原王朝足以对付。即使大举入侵，也能以举国之力抵抗。明朝长城防线上住了几十万军队，粮食基本都是南方来的，全部的力量用在防御，如果分裂，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实现。在少数民族看来，要灭掉一个中原的朝代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般仅满足于获得财富和人力。还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原长期是统一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最后那些军事上的征服者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蒙古人进来了，最后蒙古人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满族进来了，满族人被中原文化征服了，以后完全把自己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继承人了。我们讲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早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统一的核心。

第二，统一以后可以形成强大的力量来抵御自然灾害。中国这个国家的气候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相比是比较差的，中国的东部、中部主要受季风气候影响，历史上东部不是大水就是旱，几乎没有一年没有灾。和同纬度的其他城市相比，中国城市夏天比别的城市热，冬天比人家冷，你看英国的伦敦比哈尔滨还北，但是冬天一般不会超过零下5度，夏天20多度，30度都是很少。为什么中国能够支撑下来没有像某些民族那样因为特大自然灾害劫难而分崩离析？就是因为中国中原部分统一了，统一以后就具备以丰补欠、在大范围内调剂的条件，整个国家可以达到平衡，实现自给自足。

古代少数民族如何认同中国？

搜狐文化：您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数据——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只有81年。这81年的“统一”，从国家权力抵达地方疆域来说，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被统一到中央政权了？

葛剑雄：即使在81年里面，应该讲也是不同的地方统一的程度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清朝乾隆24年到鸦片战争这段时间，应该讲在它统治的地方，的确都拥有无可挑战的主权，我把它作为政治统一，但是内部有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所谓天下18省后来22省，政府设立了省府州县，这个是比较完整的建制，上面是府或者州，或者省到中央，中央的文件、皇帝的命令这样逐级下达，下面的情况逐级上报，最重要的户口、赋税都是根据中央的统一命令征收，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实际上就是一些特殊的政权。比如东北，东北长期好多地方没有人的，主要是军事驻防，通过将军衙门来管辖，清朝光绪末年才建立了东北三省。为什么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被俄国人占领？一方面当然是它侵略，但另一方面，清朝在黑龙江以北人很少，更没有及时设置行政机构，所以大多数俄国史学家不承认是侵略，称俄国人是“新土地的开发”。在新疆建立的也是伊犁将军，新疆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基本是自治的，汉人那里不多，也是通过伊犁将军管辖。内外蒙古又是一个体制，建立盟旗的制度，这是游牧民族一种，也不同于内地。另外西藏是中央派大臣的，西宁也是派驻大臣的。有些地方其实并没有派正式的行政机构去管它，

为什么？天下都是我的，这些地方我专门去设机构干什么呢？一直到清朝末年，因为主要是受到外面的刺激，比如法国人占领越南以后开始占据我们的岛，在这个情况下才派员率水师去巡海，并且在南海竖碑，命名岛的名字，要不是受到外来刺激可能不会那样做。

搜狐文化：从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来看，现代中国的地理范围大体上是继承了清朝的，包括新疆、西藏、西南少数民族省份都成为清朝版图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最初当然都是被武力征服的，后来又是如何认同“中国”的？

葛剑雄：唐朝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一些羁縻政权，羁縻府、羁縻州，对这些地方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已经接近于内地的政权行政区，地区管辖的；第二种是完全自治的根本管都不管，只要不造反就行了；第三种完全是有名无实，甚至那些地方在哪里朝廷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地图上画出来了，却讲不出名、到底什么人管，就是这种情况。行政管理是要成本的。现在为止，像西藏有几个地方，中央早就已经批准它设立县了，但还是设不起来，为什么？人太少、太分散，地方很大，成本太高。

到了元朝，朝廷在那里设立宣慰司、宣谕司、宣抚司，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慰问团，但实际上选为司的长官是谁？是当地的土著，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中央给他一个名义让他自治，类似这样不管，所以叫土司。在土司的阶段，对他们的要求是只要你忠于皇帝不造反就行，并不灌输文化。等到清朝大多数开始实行“改土归流”。什么叫“改土归流”？原来土著世袭的这些州改由流动的官治理，中央指派的或者省里派来的官取代了土司，这叫“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前提是这些地方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超过了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有了比较方便的交通路线，而且一般当地的粮食能够自给。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往往采取“改土归流”把土官废除，有的土官被迁到江西等内地。建立正式行政区以后马上开科举，办学校，逐步改变当地人的观念，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有的还给一定优惠政策，比如让当地少数民族头目送子弟进学校参加科举，通过这些方法让他逐步认同中原文化。

这个过程中间也会碰到少数民族的反抗，反抗就被镇压，这是无疑的。“改土归流”在贵州等地随着移民的进入开始有矛盾，很多汉人进去以后少数民族受到威胁，遇到这种情况，朝廷有时候用武力推广把土著废掉，但是另一方面清朝又对少数民族有种种优待，比如在那些没有“改土归流”的纯粹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像新疆、西藏、青海没法“改土归流”的地方，就依靠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或宗教领袖。“改土归流”的前提是汉族移民及当地的定居人口要占比较优势才可以，否则统治谁去？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通过对它的上层起作用，文化上很难使少数民族很快认同，主要是通过宗教，包括蒙古也是利用宗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西藏、新疆、蒙古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国家认同相对来讲比较弱，就是还没有经过文化观念的阶段。特别是新疆，中原文化的影响本来就比较弱，与中原的联系也时断时续，公元12世纪之后很多都陆续皈依伊斯兰教。

搜狐文化：现在和清朝时候有很大的差别。

葛剑雄：这个当然差别很大。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整个新疆就脱离了中原，一直到一千年以后的乾隆年间才恢复。一个地方跟你隔开一千年，而且这个期间接受其他外来宗教的影响，再加上人口上他们是绝对优势。内蒙古为什么例外呢？清朝入关前，满蒙就结盟，而且世代通婚，清朝的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公，所以它跟满族认同。随着满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再加上大批的汉人移民进入，在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已不是绝对多数了。新疆就不是这个情况，新疆要到乾隆年间才有汉人移民，以后又经过几次反复，现在的汉人大多是1949年后过去的，民国时期过去的汉人也不多，这种情况再加上宗教因素、境外的影响，在认同上就出现问题。

“一般民众应有民族文化的选择权”

搜狐文化：长期以来，海内外华人习惯于自称“炎黄子孙”，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华夏祖先能增强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但您曾极力反对以国家的名义祭奠炎黄帝，为什么？

葛剑雄：以国家的名义祭祀某一个或几个民族的祖先，并称之为各民族共同的祖先，是很不妥当的。既然《宪法》规定中国各个民族是平等的，汉族可以认炎黄为本民族的祖先，却不能强制其他民族也承认，要不然你为什么不去祭祀松赞干布、成吉思汗呢？各个民族认谁为祖先，或举行祭祀都可以，但是不应该以国家的名义。这样做会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实际效果根本没有的。

美国从来不讲一个老祖宗，大家共同的美国梦，追求自由幸福在一起，美国也不分那么多的民族，所有亚洲来的称亚裔，说西班牙语的称西裔，非洲人就是非裔，大家都是美国人。我们非要搞这些东西，不利于民族之间的融合，完全是开历史的倒车。不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自欺欺人，除了年复一年的空话以外，我没有看到究竟产生了什么积极的效果。如果有，不妨举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可惜至今没有见过。

统一的基础是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利益和前途，而不是一定要有共同的祖先。但是我并不反对民间的祭祀，比如陕西省不应该由陕西省委省政府组织，应该由陕西各界祭祀黄帝委员会，既然对老祖宗那么好，就不应该拿国库的钱，应该自己拿钱出来祭。其实这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统认同，应该承认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搜狐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没有因为主要民族的文化优势和政治统治，导致一些弱小民族文化的消失？

葛剑雄：这个是一直在进行着的。比如说孔子时代就讲夷夏之辨，强调如果学了华夏礼仪接受了这个政治制度或者文化，那么可以由夷变夏，相反会由夏变夷。华夏诸族发展过程中，其他一些民族及其文化不可避免地消失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的一些积极因素，比如说汉族的前身，华夏发展过程中间吸收了不少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不符合它要求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都消失了。比如骑马，是学北方的胡人，音乐舞蹈很多来自中亚，还有很多物质上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符合统治者观念的，很多地方习俗在这个过程中都被消灭了。清朝就把汉人以前的服装全部改掉，发式都改掉了，何况对少数民族。好比我们现在讲现代化就是西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就是汉化，最典型的就是拓拔鲜卑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把姓都改掉，规定皇族重新与汉族大族结婚，死后坟墓不许葬回北方，籍贯改成洛阳，50岁以下的鲜卑人在朝廷必须讲汉话不许再讲鲜卑话，很极端的。但是孝文帝自己也讲了一点苦衷：我也是没有办法，如果大家不跟我这么改，难道你们世代代都在北方这个穷地方，不识字地过着原始的生活吗？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进步是可以看到的，它的进步要付出代价，要是没有这些融合过程，包括这类强制措施，有今天的汉族吗？有今天的中国吗？

今天说倡导地方文化，各地要保护方言，有其必要，但不能过度。秦始皇统一后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书同文”，统一文字。中国的方言那么多，那么复杂，要是没有统一的文字，早分裂成不同的国家了。必须在统一的文字、共同的语言的基础上保护地方文化和方言，过度的强调地方文化包含着离心的倾向。欧洲有些小国就有语言之争，像比利时这么小的国家有大概8个还是9个政府，就是因为居民使用不同的语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区的重要基础就是汉字、汉语，比如越南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像胡志明这一代都是学的汉字，以前官方的文书、科举考试都是汉字。后来法国传教士到了越南，很快帮他们制定拼音文字，汉字不再是越南的文字了。

搜狐文化：众所周知，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成为“中国”一部分后，汉化的程度很大。对比今天，在强大的汉文化面前，少数民族如何才能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葛剑雄：我的看法是这样，作为一般民众有他的选择权，外界是不应该去干涉的。西方有些人有种很自我的心态，他希望少数民族永远保持着一个活的博物馆供他们去观赏，供他们去研究。外国人跟我讲，他到了拉萨很伤感，全是汽车看不到牦牛。我说我到你们国家去，你们的马车在哪里？你们为什么可以开汽车，藏族人为什么不可以开汽车？藏族人以前骑马，你问问他们骑马舒服还是骑摩托车舒服？为什么澳洲牧民开着直升机放牧，我们的藏人就不可以？这些都很狭隘的。

另一方面，从专家学者、国家层面上讲，为了保存历史的记忆，我们要选择一部分把它保存下来，不能保存的，我们要赶快记录下来。但是不等于说，因为要这样，就要人家不现代化，除非他完全自愿。我80年代到西藏去，西藏原来是没有方便面，没有“方便面”这个词的，刚开始买的是康师傅方便面，藏民就称方便面为“康师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语言中，都有不少外来语，有的就采用音译。不采用外来语言怎么行呢？中国汉语词汇里面多少语言是外来语？上海话里面很多都是外来语，实际是英文，这个挡不住的。反对的人看到外国人用汉语很高兴，觉得中国文化影响真大，那为什么人家不能影响你呢？所以我刚才讲一个民族它要接受什么文化要怎么样，一个地方要讲什么话，这是谁都阻挡不住的。如果藏族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不用任何新词汇，那怎么跟你对话？比如说我坚持讲上海话，上海话很多词是原来没有的，你为什么能够接受英文，就不能接受普通话呢？全世界任何语言都会受到外来影响，都是不断演变的，文化也是如此。这是民生民众自愿的选择，需要跟我们今天专家学者以及国家层面上把它分开。

“尊重不同族群才是真的民族平等”

搜狐文化：这几年“复兴传统文化、重建文化认同”的呼声也挺高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葛剑雄：不可能的事情。简单地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适应农业社会的，现在到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就不适应了，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总要先有衣食住行，才能有政治文化活动这些，现在回头看中国大量的南北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念，基本上适合农业社会。比如传统文化的孝道，孝的真正的本质是家族的延续、人口的繁衍，所以当初要结婚承担家庭责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无后了，这个家庭怎么延续？家庭不能延续，社会也不能延续，那才是孝的本质。为了做到这一点，父母要给你找老婆。

搜狐文化：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统一政权中发生的民族冲突分裂问题，究竟是治理本身有问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葛剑雄：统一有它的范围，统一无限放大的话，那么这个统一只能是专制极权，注定要失败，而且是以牺牲个人、族群、地方正当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开放第一是要使一种契约的方式明确权利分配，哪些是地方的，哪些是中央的，哪些是集体，哪些是个人的，同时要有真正意义上的群体之间、民族之间的平等。到现在我们还认为对少数民族应给点好处、照顾照顾，这并不是真正平等的观念。要强制人家承认是炎黄子孙，甚至研究出来什么藏人是禹的后代，不是这么简单的，从来没有站在人家的立场上看一看。对蔡文姬歌颂她，内蒙古的人恨死，什么话啊，她把丈夫孩子都扔掉，还说是民族友好，这干什么啊？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站在人家的角度想一想。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169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